

日本的政治、回憶和歷史意識

◎ 薩勒 (Sven Saaler)

一 引言

在同代人眼中和後代人的轉述中，歷史事件常常以不同的面貌出現。當路易十六於1789年7月14日在他的日記中寫下「今日，無事」時，人們一方面可以將無知強加於他，另一方面卻也可以從中推斷出所謂的「攻佔巴士底獄」這一歷史事件之意義其實微不足道。因為正如法國歷史學家所闡明的一樣，對於這一改變歷史進程的重要事件的描述始於十九世紀末，如此一來，在此前「攻佔巴士底獄」就如同未曾發生一樣。當時人們對其確實不甚關心，尤其是國王和政治家們只是把它視為一次無足輕重的治安騷亂而已。

儘管如此，攻佔巴士底獄的象徵意義和對此事件的回憶，對於法國的民族歷史編寫和現今法國身份的價值是不容低估的。但是這種意義和此事件的真相或者真實性毫不相關。在這裏歷史與回憶分道揚鑣，特別是打上了民族意識烙印和受政治影響的回憶。這兩個概念有時會被完全等同起來，一直到諾拉 (Pierre Nora) 的研究才明確了，回憶並不同於歷史，因此必須區別對待。

法國大革命雖然已經過去二百多年了，但是歷史學家和其他學者還是一如既往地探討其產生的歷史意義，而且愈來愈深入討論這次革命在法國人的追憶中和法國民族集體身份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歷史學家科澤勒克 (Reinhard Koselleck) 認為，隨著歷史事件距離今天的時間愈來愈長，對其辯論也就愈客觀，其歷史意義也就愈加凸現出來。但正如阿斯曼 (Aleida Assmann) 所強調的，並非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是這樣。針對德國當代歷史的辯論，尤其是對納粹時代的討論，正隨著時間跨度的增長而加劇。在日本，我們可以觀察到對於「亞太戰爭」(1931-1945) 歷史意義的討論具有與之相似的發展。這裏，也同樣可以確定的是，辯論更加激烈且富有感情色彩，討論的中心大多不是史學觀點，而是關於確立戰爭回憶的爭論。政治觀點在這些辯論中佔據主導地位，而史學標準則退居其次。針對亞太戰爭意義的辯論，其「戰場」則必須由歷史教科書和回憶模式或者說回憶政治來充當。

接下來應該說明的是，從90年代下半期開始引起愈來愈多廣泛關注的歷史修正主義與政治緊密合作，在公眾中用修正主義的歷史觀注入回憶模式，也就是說，將現代日本的戰爭描述成純粹的保衛戰爭或者乾脆將亞太戰爭作為亞洲解放戰爭予以肯定，聲稱在此期間日本一直扮演著歐美帝國主義犧牲品的角色。雖然歷史修正主義致力於改寫國家的總體歷史，但關於亞太戰爭闡述的問題，基於其政治目的一直是修正主義敘述的核心。關於回憶模式以及日本歷史教科書內容的討論之所以如此激烈，這主要是因為，雖然引起廣泛轟動的修正主義歷史觀在公眾中支配著回憶模式，但在日本社會中明顯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因此只能將其稱之為無法達成統一意見的少數派觀點。

二 政治與回憶

我們一再地看到，日本不願正視其戰爭責任，不承認其對戰爭負有的責任，也沒有因此對其亞洲鄰國致歉，而且否定「亞太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的本質。我們對這些也經常出現在西方媒體中的籠統評價要加以區分。但在這之前我們要試著去解答，是甚麼尤其使外國觀察者留有這種印象，即日本政府否定日本的戰爭責任和日本參與的那些戰爭具有侵略本質。

在談到日本時，有意味的是，人們往往會首先專注於日本的政治層面，並通常將其擴展為日本全國民眾。在政治上處於支配地位的保守的統治集團中，也就是在自民黨和部分在野的民主黨中得到廣泛傳播的，的確是關於日本戰爭歷史的修正闡述，這些與歷史研究主流大相逕庭的論點，都可以從日本政客所謂的「暴言」中察覺到。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場至今仍堅持1995年村山首相的聲明，「由於遵循錯誤的國家政策，日本走上了戰爭的道路，這場戰爭使日本民族陷入了一場毀滅性的災難之中。同時在其殖民統治和侵略中，戰爭也給其他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的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和痛苦」。該聲明中承認「錯誤的國家政策」和日本對於亞洲國家的侵略。在另一方面，一直持續至近期的「暴言」以及我們在國家博物館、紀念碑及紀念儀式中聽聞的歷史闡述都違背了這份聲明，或者說對這份聲明大打折扣。因此總的說來，我們可以從日本民眾中出現的回憶模式，即回憶政策中觀察到修正主義的歷史論調佔據了明顯優勢，且這些闡述的總體構成了——不僅僅從外部觀察到的——與日本政府的官方闡述相悖的另一種官方歷史觀。

靖國神社算得上是日本民族主義回憶政策的中心，它也是在公眾中進行的關於修正主義歷史觀的辯論的焦點。靖國神社中供奉了那些在日本民族近代戰爭中的陣亡者。但這裏特別引起爭議的一個事實是，在總共約240萬被尊稱為「英魂」的陣亡者中，竟也包括了七名在遠東軍事法庭被判處死刑及七名在被押過程中身亡的甲級戰犯。該事實同在神社博物館——遊就館中陳列的神社歷史觀有著直接聯繫。這個以「更準確的介紹日本近代歷史真相」為目的的博物館所展示的是一種經過粉飾潤色的陳述，其中大部分與主張歷史修正主義的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以下簡稱編纂會）大力鼓吹的陳述相符，因此，近代日本的歷史就被描述成一部英勇地對抗「西方」的解放戰爭史，其中的每個章節都流線型的編排入具有單一原因和延續性特色的陳述中，也包括自1931年發動的對中國乃至亞洲的侵略戰爭。

雖然靖國神社自1952年以來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宗教法人」，其歷史觀點與國家歷史觀點也沒有直接的聯繫，但是政治家對其進行的定期參拜已使神社成為國家回憶政策的一部分。靖國神社在戰前毫無疑問是代表國家神道的三大支柱之一，也是國家回憶政策的一部分。這份遺產影響至今，尤其是首相的參拜自然賦予了其特殊的象徵意義。基於國際方面的影響，日本首相於1985年結束了對靖國神社的參拜，但除了橋本龍太郎（1996）作為遺族協會主席的參拜外，小泉純一郎是自1980年以來首位以官方名義對神社進行定期參拜（2001-2004）的首相。通過這些參拜活動，靖國神社將成為國家回憶政策的組成部分，神社歷史觀也被獲准成為日本的另一種歷史觀——因為通過他的參拜行為，日本首相沒有同神社歷史觀劃清界限，同時還放棄了參拜其他紀念館的（唯一）可能。

儘管如此，選擇的範圍還是大大受限，因為其他出現在公眾視線中的紀念館以及紀念儀式也不具備歷史的批判反思性。至今在日本還沒有出現一個國家級的以紀念戰爭和陣亡者的紀念館。靖國神社供奉的只有軍隊陣亡者，而「千鳥之淵」紀念館還供奉著平民陣亡者。在日本侵略戰爭中的亞洲（及其他國家）的遇難者卻沒有在任一個日本的國家級紀念館中得到供

奉，只給在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中罹難的韓國人樹立一些紀念碑，而這也正是引起批判聲四起的原因所在。

90年代前半期，這種批判在紀念戰後五十周年的過程中達到了高潮。在這段時間內，就是否要建立一個主要紀念館進行了討論並已經開始著手規劃，相關負責的委員會在社會部（厚生省：主管衛生福利的部門）的主持下還召開了會議，但在支持批判歷史闡述的贊成者和反對者之間卻出現了極深的分歧，致使這項計劃化為泡影。已經計劃好的預算資金則在遺族會的負責管理下，用於建設一座鄰近靖國神社的紀念館，即昭和館，除此之外在新宿也建造了一座「平和祈念展示資料館」。不過，即使這些「紀念館」也是一再為戰爭辯護，至少沒有從正面談到日本的戰爭責任，而是更多強調了日本的獻身精神。因此無論在國外，還是在日本社會，它們都不會被看作是替代靖國神社的紀念館，而且只有極少數的參觀者（參見附表），無法被視作是社會共識的體現。

關於亞太戰爭的日本紀念館及博物館的參觀人數（2001年）

博物館／紀念館	參觀人數
靖國神社	600萬
遊就館	161,000
千鳥之淵紀念館	180,000
昭和館	62,000
平和祈念展示資料館	36,000
廣島和平紀念館	110萬
沖繩縣和平紀念館	340,000

因此，不但關於建立一個能得到普遍認可的戰爭紀念館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而且，政府也一再對興建新紀念館的計劃表示不贊同。雖然2000年在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倡議下，內閣官房長官召開了關於建立紀念場所以及其他追悼陣亡者、祈求和平的紀念碑等設施的懇談會，並於2000年12月發表了一份「中期報告」，肯定了建造一座新紀念館的必要性。但是，小泉政府對這份報告並未作出任何政治評論，懇談會也自2000年年底以後再也沒有召開過。批判者早已對此做出了以下評論：即使是委員會報告中提出的以悼念陣亡者為目的的「新機構」，也無法給日本的回憶政策帶來任何決定性的變化，它至多也只是在持續至今的討論範圍中有所活動而已。在批判者的眼中，就連委員會原則上對其必要性已經加以肯定的「新機構」也算不上是日本對其戰爭責任的公開懺悔，而只是一個祈求和平及悼念所有並非嚴格定義上的陣亡者的場所，雖然「臨時聲明」稱不應強制參觀者接受「單一的歷史闡述」。

由於近幾年來針對回憶政策討論的激化，一系列的官方或私人的紀念館和紀念博物館出現了。如2000年在沖繩縣的官方和平紀念公園中設立了新的博物館，它按照村山聲明，將日本近代戰爭稱之為侵略戰爭，並根據區域歷史的特點將其開始的時間確定為1876年，當時日本併吞了仍處於半獨立狀態的島國琉球，從此，日本開始了邁向對外擴張的第一步。跟在廣島和平公園的其他博物館一樣，這個博物館雖然在國家的回憶政策中只扮演著一個不起眼的角色，但是我們不能低估其對初、高中青少年的歷史理解力所施加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博物館和紀念館中對日本戰爭歷史的批判性描述十分罕見，大部分項目還是為保守的政治統治集團和歷史修正主義運動的精神所鼓舞的，將日本戰爭描繪成一場為解放東亞而進行的

「聖戰」。因此，博物館的建成不僅在韓國，也在沖繩縣激起了強烈憤慨。

三 回憶政策及歷史意識

如果對日本民眾中普遍持有的歷史觀進行分析，可以看到編纂會的歷史修正主義的敘述所佔有的絕對影響力。由於一個國家的回憶模式常規上是基於社會的一致意見，許多觀察者得出結論，認為在公眾回憶模式中佔主導地位的修正主義的歷史出發點在國民中應該也相應的擁有很多的支持，歷史修正主義「編纂會」成員所出版著作的高發行人數似乎也有力地論證了這個假設。所以當專家們談及編纂會時，認為其是日本社會「難以應付的社會基礎」。為了核實或者駁斥這種假設，有必要看看日本的「歷史意識」，這也是近年來引起愈來愈多研究興趣的課題。

關於歷史意識這個課題的科學研究最先是在戰後的德國發展起來的，並且與歷史教學法緊密聯繫在一起。近幾年來，我們也可以在其他一些國家看到類似的發展。2000年在加拿大成立的「歷史意識研究中心」是如下定義「歷史意識」這個概念的：對於歷史意識的研究是不同於歷史研究和歷史編纂學研究。其區別在於，當我們研究歷史時，我們是在觀察過去；當我們研究歷史意識時，我們是在研究人們如何看待過去。同樣的，研究歷史意識也有別於歷史編纂學研究，後者只是深入觀察歷史學家是如何看待歷史的。因此歷史意識可以被定義為個人和集體對於過去的理解認同，是形成這種理解認同的認知和文化因素，以及對於現在、未來和過去的歷史理解之間的關係。在日本，歷史學家吉田豐最早對該意義上的日本人的歷史意識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借助民意調查和普及發行物來調查日本人對其國家戰爭史的看法，並於1995年發表了論文〈日本人的戰爭觀〉。近幾年來，尤其是在有關日本戰爭歷史闡述的辯論不斷升級的背景下，一再有民意調查研究此類課題，我們可以視之為有關日本歷史意識的經驗調查。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一份由公私合營的電視台NHK（日本廣播放送協會）所屬的民意調查機構於2000年總結的一份民意調查的結果，它對於理解在日本出現的針對歷史教科書和回憶模式的辯論是極為重要的。

在這份針對日本人對於戰爭與和平所持觀點進行的民意調查中，參與者被問及了關於當代日本歷史的問題。其結果出人意料的明確，並由此可推斷出，歷史修正主義的論點在現在的日本社會幾乎沒有立足之地。只有很少一部分接受訪問者否認了日本戰爭的侵略性質，或是否認了年紀較輕的一代現在仍需為日本在戰爭期間的行為承擔責任。在回答是否將「亞太戰爭作為侵略戰爭」這個問題時，51%的人給予了肯定答覆，只有15%的人否認了其侵略戰爭的性質。超過50%的人認為，即使是年紀較輕的一代也必須為日本的戰爭罪行承擔責任；27%的人否認了這一點。就這個問題不同時代的人之間也顯示出巨大差異：在十六至十九歲的人中對此問題給予肯定回答的佔69%，而在超過六十歲的人中卻只佔了38%。鑑於一些歷史修正主義作家深受青年人喜歡的情況，這個結果也許大大出乎了人們的意料。然而如我在對近一千名日本大學生所進行的民意調查中所顯示的那樣，NHK所得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實際並且可以得到持續驗證的。即使將一定的誤差比例算入其中，我們也必須說，儘管宣傳與發行刊物的活動勢頭強勁，但總的說來，歷史修正主義運動目前在日本青少年中還沒有形成良好基礎。通過詳細的調查無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歷史修正主義的一些個別觀點雖然受到青年人的積極擁護，但處於當代歷史修正主義中心的對於戰爭和日本殖民歷史的肯定闡述，很明顯是難以獲得普遍承認的。

有意思的是，根據NHK調查結果所顯示的數據，我們還可以確認一種令人驚訝的事實。例如根

據前述吉田豐的文章引用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90年代初，不承認亞太戰爭是侵略戰爭的被訪問者也只佔到總數的15%——同樣從總體人數來看，歷史修正主義運動至今仍未導致任何對歷史理解的重大改變。因此歷史修正主義雖然在90年代中葉頻頻在媒體亮相，但它在民眾中並未尋得其發展基石，且只能看作是少數人的意見——一種基於其政治聯繫而極富影響力的少數人的意見。

顯而易見，編纂會的歷史修正主義並沒有動搖已經形成的歷史觀，其中包括了被編纂會稱為（仍舊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日本史學的「自虐性」的闡述，但儘管要通過教科書審批程序，它至少已從80年代起在日本學校的歷史教育中佔據主導地位。另外，通過大眾文學得到普及的歷史闡述，如司馬遼太郎（1923–1996）的歷史觀被視為阻礙歷史修正主義廣泛傳播的堡壘。司馬的「歷史小說」一如既往地享有極高的盛名——尤其在日本青少年中。司馬最負盛名的是在60年代出版的《龍馬向前邁進》，這本書賣出了二百多萬冊，並且一再被改編成電影、電視連續劇甚至刻為電腦光盤。司馬並非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批判歷史觀的代表者，而是在他的小說中構築了「光明的明治時代」與「黑暗的昭和時期」二分世界。但司馬在他的歷史雜文，如一共六冊的《這個國家的形態》（國）中，明確無誤地將30年代的戰爭稱作是不負責任的侵略戰爭，同時將「大東亞共榮圈」稱為是對日本擴張政策的純粹的美化。司馬持久不衰的盛名毫無疑問對歷史修正主義的觀點在當今日本難以立足起到了正面作用，因為司馬的雜文如他的小說一樣是暢銷書。此外，一直以來在日本牢牢確立的和平主義，也是阻礙對過去戰爭的肯定闡述的傳播和與之相關的積極看待過去和將來發動戰爭的因素。

基於其與個人、組織及政界和財界的支持，歷史修正主義運動毫無疑問在今後幾年中仍然具有激起激烈的社會辯論乃至國際爭端的潛力。為了能長期遏制歷史修正主義課題的傳播，日本的史學必須對截至目前佔主導地位的民族主義史學觀點的狹隘和局限性進行批判性的探究，並且確立將歷史修正主義的新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視為腐朽的糟粕的新觀點。在此，也必須探究司馬的歷史觀，他之所以這麼受喜愛，是因為他的作品是建立在對自己國家「輝煌歷史」的渴望基礎之上的。對於司馬的一些小說在韓國引起驚人反響的探究同時也提供了一些依據來解釋如何將既受到民族主義影響和鼓舞，但同時又極其個人化的司馬的觀點和後民族主義的或者跨國界的歷史闡述結合在一起的問題。

薩 勒（Sven Saaler） 德國日本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日本東京大學副教授，著有 *Politics, Memory and Public Opinion: The History Textbook Debate and Japanese Society* (2004)。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5年8月號總第九十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